当代马克思哲学

一、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意义及所蕴含的问题

1.体现了新时代对于人的主体性弘扬之主导精神，对于缺失能动性原则的机械唯物主义之纠正。

从前机械唯物主义的误读。

俄国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纳入到一种一般的历史哲学的决定论系列之中。社会历史变迁的必然性，植根于自然必然性，理想社会亦成了一个如同自然界的变化一样的东西，必然地会在某一个时期到来，即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这种基于科学的决定论式的单一逻辑的论证，使人的主体能动性对于理想社会的构造变得可有可无。

一方面，这一阐释的原初目的便在于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动方面，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毫无疑问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人的主体性弘扬的主导精神的，

2.内蕴“能动性”+“受动性”的双重诉求之张力。

贯穿着一个双重的核心诉求，那就是在将实践概念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基本的和核心观点的同时，又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强调前者，自然是要将能动性或主体性这一新时期的时代精神表达出来，为在传统教科书体系中被忽视了的人的能动性提供一种哲学依据；而主张后者，则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唯物主义原则，亦即要将这种能动性保持在客观制约的范围之内，而不至于跨越界限，走向一种受指责的“实践唯心主义”。

就此而言，“实践唯物主义”这一名称，最好地表达了这种双重诉求。“实践”，体现了人主体改变世界的能动性，而“唯物主义”则指明了这种能动性的制约条件。可以说，“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就是“实践”+“唯物主义”，或“能动性”+“受动性”。

显而易见，“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所内蕴的双重诉求之间是含有根本性的张力的。因而，这一理论主张如果不仅仅满足于只是表达某种体现了新时期时代精神之弘扬人的主体性的诉求，而是要将之发展成为一种理论体系，以取代传统的忽略了能动性的体系，便必须面对这种张力，并将之加以消除。

既然“实践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实践”+“唯物主义”，或者更明确地说，就是“能动性”+“受动性”，那么，消除这其中张力的根本之点便是设法证明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能够融为一体或至少双方是能够兼容的，并没有从通常眼光所见到的那种悖反。

既然问题在于上述解决方式忽略了“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那么，解决问题之道便在于同时将主体与客体或者说行动者视角与旁观者视角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去考虑。这种考查方式便是从那种抽象的本体论思维方式进展到人的具体的现实活动的方式。而人的具体的现实活动便是人的历史性的社会活动。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关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在这种阐释中，活动的社会历史性被凸显了出来，主客体之间的对立，也有赖于通过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而获得克服。于是，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

从实践性去理解历史性，是一种具有主导性的理论趋势。这样，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便在很大程度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复活了。如果说此前的讨论虽然意在改革源自苏联的法国唯物主义式阐释的教科书体系，但就其以抽象的方式谈论主客体关系而言，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其影响之下，而这里所说的从“实践唯物主义”发展而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则自觉地将社会历史性放置在了理论的核心地位。因而，基于对社会历史性维度的高度关注，这种凸显了黑格尔主义之影响的“历史唯物主义”，便与传统教科书体系中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之“推广”的法国唯物主义式的历史决定论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大不相同了。

从“实践唯物主义”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就能够消除前者概念之中内含的张力呢？为论述的简单计，我们对此问题可以这一进路的典范即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例来看。就对马克思哲学作黑格尔主义的历史主义的理论阐述之富有创造性和系统性而言，恐怕迄今为止没有哪一部著作比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构造得更为成功的了。且缘于此，卢卡奇的这部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著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史上也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典范作用。事实上，近几十年中国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方式可以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处在青年卢卡奇的思想火力射程之内的，甚至尚远未达到其理论之深度。因此，青年卢卡奇那里所存在的问题，自然便是中国“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进展也必定要面临的问题。

卢卡奇的这一阐释进路以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为原则，将自然世界也加以社会历史化，正是一种典型的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方式。其基本思路是将历史理解为人的活动的产物，历史过程中主客体的分裂，导源于人的活动在无意识中的异化或物化，而异化的扬弃，主客体的统一，有赖于历史主体即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自觉。这种阐释方式必以某种始源性的本然状态为起点，然后进入对象化或异化状态，再在某种条件下扬弃异化，复归于圆满状态。是为否定之否定。但这类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主义的阐释方式的问题是，如何说明原始的圆满状态之进入或陷入异化，以及如何扬弃异化复归圆满状态。撇开无法说明圆满的东西如何能够“坎陷”为不圆满之物这一异化之起点的困难不论，如何扬弃异化复归圆满仍然是一个无法合理地说明的问题。这当中绝对的困难在于，卢卡奇原本要说明的是无产阶级个体如何陷入异化或物化意识之中，又如何从中解脱出来，但最终却只是说明了作为总体的无产阶级意识如何可能在物化之发展中产生出来，至于个体的自觉意识，则只能诉诸由先知先觉者的赋予。如此一来，便又回到卢梭式的“公意”与“众意”的二律背反之中去了：或者个体只能是被感性欲望决定的自然存在物，或者只能是被某一超越于个体的总体性所决定的傀儡式存在物。

尽管目下学界对于“实践唯物主义”的黑格尔式阐释尚未进展到如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那样一种系统化的程度，或者说，尚未遇到卢卡奇所遇到的理论困难，但从逻辑上讲，如果要进展下去，终究会遇到同一困难的。因此，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遇到的困难亦可视为“实践唯物主义”之黑格尔历史主义式阐释迟早会遇到的困难。因此，我们必须探寻新的解决之道。

二、**卢卡奇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的积极意义与内在缺陷

1.批判了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之能动的革命意识提供了一种哲学论证。

第二国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经济决定论，也就是历史的发展，可以撇开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而以历史的必然性为终结。这走向的是单一的唯物主义，将现实、感性、对象仅仅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感性的人的活动，站在人的主体性角度上去看。这也就导向了人不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与客体。

因此关于人的能动的方面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即使在唯心主义中失去了现实、感性的层面。

因此卢卡奇做出的努力就是，恢复黑格尔的哲学传统，使马克思直接衔接黑格尔，得到人的“能动的方面”。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中同一的主体与客体，作为客体，它的出现和发展历史是被动的；但是作为主体，需要去打破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冲破现有的制度。能否实现取决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阶级意识）能否产生，也就是一个阶级所共有的意识——认识到自己被物化了，使得总体性认识失落。

当出现阶级意识后，无产阶级重拾了总体性认识，真实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力量也就随之促成了实践活动。因此这种对于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认识，将历史变化的基础奠定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之上，人作为历史创造的能动主体。

2.以总体性的无产阶级为主客体，背离了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之基本原理，回到了黑格尔式的总体性出发点，导致总体性无产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个体意识的脱节。

黑格尔的主体与客体同马克思的是不同的。

黑格尔的主体是绝对精神，与实体相对立，本质上是人的自我意识，能够自身独立存在。但是马克思的主体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而自我意识是人的一种能力，不能脱离人而存在。

因此黑格尔将主体错置的后果是，绝对精神，及体现绝对精神的国家是人类历史的主体，个人不过是绝对精神用以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而已。作为总体的国家、社会表现为个人。但是马克思认为个人的物质活动即是生产力，因此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由个人而有社会和国家。

导致总体性无产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个体意识的脱节。对于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认识，将历史变化的基础奠定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之上，人作为历史创造的能动主体。

而不是绝对精神所表现出来的历史。

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是对象性活动”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

1.以“人”与“对象性”的共在超越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论。

费希特的绝对自我有绝对的能动性，融合主客观为一体，自我的客体源于主体自身，是主体外化的结果，主客体联结感性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

但是费希特的自我并非真正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而是一种脱离自然的抽象精神，因此只有主体性的存在，没有真正对象性的存在。

而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活动对象是自然，人自身是自然存在物，因此人的对象性活动是自然之能动性的展现，对象化和自我都得到确证，也就使得主体性与对象性共在了。

2.以“对象性”超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非对象性活动。

马克思的对象性指的是人。也就是主体之外存在着现实的感性的对象，对象不是与的存在无关，而是人的生命得以可能的必需之物。也就是说，就主体而言，对象存在于主体之外，不依赖主体，同时还因为是主体存在所必需的，也就是确证主体本质所必需的。

“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这直接挑战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主体的绝对性，直接导向不存在真正与之相对的对象，其辩证运动也就缺乏真正的对立面，是内在于意识层面的非真实运动，无法走出意识的内在性。

3.以“活动性” 超越费尔巴哈的“存在”。

马克思以“人是对象性活动”扬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是对象性存在”。

费尔巴哈只承认了人是感性的现实存在物，也就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现实生存必要以感性的、现实的对象为前提条件。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关系，局限在感性、直观的对象。

马克思承认了对象性，但是将其发展为具有能动性的对象性，也就是对象性活动。通过对象性的活动确认主体的存在，也就是人以独有的对象性活动创造自己的对象。

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方法论意义

1.一般而言，一部著作的“序言”是对于该著作的基本前提。方法论原则之交代，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科学方法基本原则的建立。

以观照总体的历史解释学向科学的方式去把握精确性的方法论转变。

二者都是杜宇是在世界的抽象建构，而非直接表达，并不是通过对于经验材料的归纳整理而来的对于是在世界的直观反映，也不是黑格尔的以绝对精神的自我认知为主体。恰恰相反，依托现代科学，以经济生活为对象，考察其客观有效性，通过精确科学所揭示的事物运行的规律而有效地改变世界。

因此在历史解释论把握总体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实证研究，揭示资本主义之运行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运行、内在矛盾做出精确的把握，以科学的方式揭示出资本主义大限何在，从而为改变这一社会形态提供有效的指导。

2.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社会生活中决定性的力量，因而应该从物质生活去说明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不是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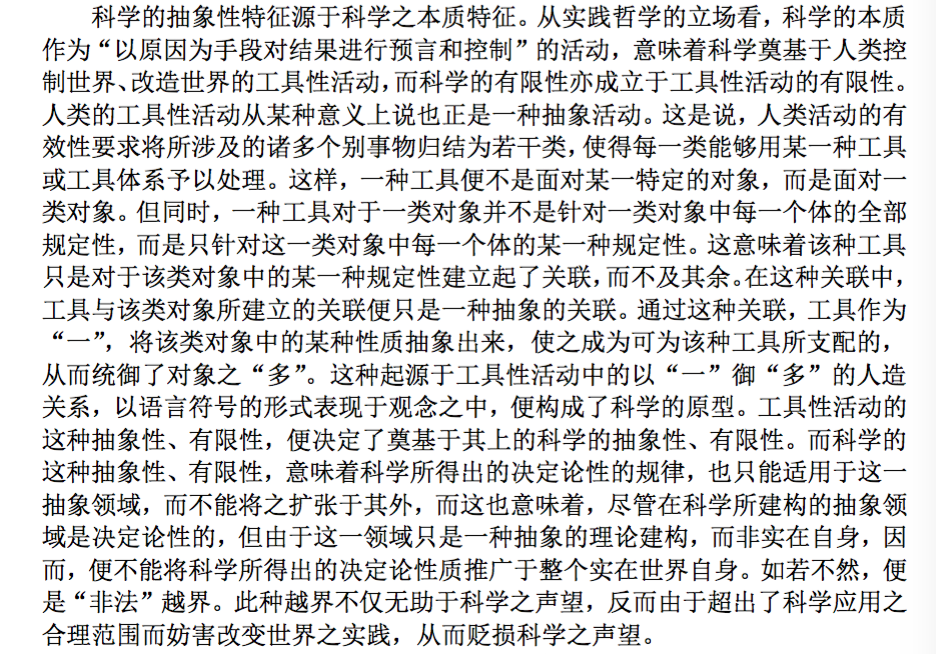
决定可以理解为制约社会方式的形态能达到的最大值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决定性力量不等于决定论。

马克思的决定论是建立在其目的之上的。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原则指向的是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因此要有效地改变世界，就必要借助现代科学对于世界的把握，而现代科学又是决定论的。因为现代科学的目的与马克思哲学殊途同归，都希望能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因此就必要找到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客观有效的恒长关联，即在其中建立一种决定论关系。

二者既然目标相一致，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马克思将他所欲改变的恶资本主义世界变成科学的对象，以科学的方式去把握这一世界。

3.由于只有物质生活的经济条件才能够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加以描述，因此必须把这一领域与意识形态领域分开来进行研究。

分开的原因是，其一，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导致抽象精确科学的有限性，因此理性所建构的科学在适用范围上是有局限的，既然人类对于世界的掌握方式是多样的，那么就意味着，人们在从事某一类型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之时，必要认识到其有限性，从而通过各种方式的互补达到较为完备的认识。



其二，与抽象的精确科学相对的，动态地、历史地、与人类主体相并联的范畴来理解实体，作为另一种解释模式的历史解释学，是对于社会实在自身的总体性把握，这种把握既然是总体性的，也就不可能通过对于经验数据的精细分析来进行，只能是借助于某种意义上的思辨来进行。马克思既然要求哲学通往改变世界，那么改变世界的前提是世界能够改变，也就是并不是全然决定论的，这也就回到了总体性的把握上。

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思想具体”与“实在主体”区别之意义

1.与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划清界限。

黑格尔认为，观念并把观念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创造主，现实事物知识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马克思反对这一点，认为观念的东西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作为政治经济学所把握到的“具体”，并非“实在主体”自身，而是“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即思维所构造出来的“思想具体”。

黑格尔将知识理解为绝对精神之自我认识，将思维和与思维相对的实在主体合二为一了，使得思维成为唯一的绝对。

2.建立起行动者与科学观察者双重视角。

也就是人作为对象性活动主体的二重化，主体与对象处在不同的关系中。

在一种关系中，主体与对象处在“对象性活动”关系之中，主体关于对象知识，是一种包含于对象性活动中的直接性的知识。也就是行动者的实践世界存在。

另外一种则是对于实在的科学把握方式，主体面对的不是活生生的对象性存在，而是从作为整体的实在中抽象并建构起来的关于实在的模型，对象是被置于主体之外的抽象物，因而也就是置身事外的科学观察者的理论世界。

这样一种处于对象之外、与对象相对的抽象的主体,自然不再能作为“对象性活动”的活动者或行动 者而存在,而只能是一种置身于事外的“旁观者”。由于此种情形下主体置身于事外,且由于科学的对象是以抽象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因而这一对象就能够被视 为完成了的存在物,一种能够以“盖棺定论”的“事后”的方式,亦即决定论的方式对之进行描述的存在物。这也就决定了科学关于事物的描述必然是因果决定论的。

其本质上，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二者之间具有张力，也有辩证。

3.为《资本论》科学体系的建构奠定方法论基础。

A合理的基础。

科学将自身的对象限制在一个能用量化的语言加以描述的领域内。这种自我限制，是科学活动主体对于人类理性之有限性的一种自觉，这就为科学的可能性奠定一个合理的基础。

B方法论的二元论。

科学的对象并非直接的实在自身，而是思想从实在领域或“实在主体”中抽象出来的一个领域，是实在主体在抽象层面的一种重构。

科学作为工具性活动的抽象，根本特征在于构建了一个高度确定的因果关系的严格体系，，也就是决定论体系。但是这种决定论被局限在科学这一对象性活动的范围里，所反映的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一个方面，并非全部，对于对象性活动的整全性把握，仍需要超越科学的方式，比如宗教、哲学等。因此决定论的科学与改变世界自由得以共存。

这就走向了历史科学，也就是将社会实在抽象出来，将对象看作是对于经验材料的一种构造，使得研究人类社会的经验性研究成为可能，以科学的客观性指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

六、马克思正义论的基本特征

1.以自我所有权为基础的按劳分配原则。

在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中，“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与“资产阶级权利”的按劳分配领域对应起来。在必然王国中，人作为现实的存在者以生命的自我持存为首要目的。当中等匮乏时，人们对于财富和利益必定提出相互冲突的要求，而正义就是对这种自然的不足的一种补救措施。因此正义需要一个基本原则。

通过洛克的自我所有权理论，也就是劳动创造所有权的理论，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并建立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2.以人的自我实现为基础的对于前一原则导致的收入差异进行调节。

但是自我所有权的承认意味着对每个人天赋能力差异的承认，也就顺势承认了由于这些差异而导致的不平等，将不平等合理化了。

因此要维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不正当性的批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是平等和共享的价值维度做出正当性的辩护。马克思吸收了康德的目的论思想，认为人类存在是以自我完善为趋向的，因此追求自然王国的过程也是自身全部潜能的自由发展。自我实现的目的论使得按需分配对按劳分配介入的合理性。

3.前一原则是建构性的，后一原则是调节性的，调节之程度取决于历史条件。

自我实现的原则是为了调节自我所有权在为资本主义不平等辩护时所犯的错漏。在现实社会中，基于自我所有权原则，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而在此基础上，针对可能出现的不平等，基于自我实现原则，应当对按劳分配的后果做某种调整，以使得不平等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

只有在消除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按劳分配的价值原则才能够得到真正完全的贯彻。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按劳分配的原则受到了私人所有的严重破坏。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因此需要按需分配的介入。

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这两个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原则: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 而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则“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联系到上述两个王国的对比,这一两阶段或两层面的对比,便亦意味着两种分配原则对于现实 生活的构成性与范导性之间的对比。